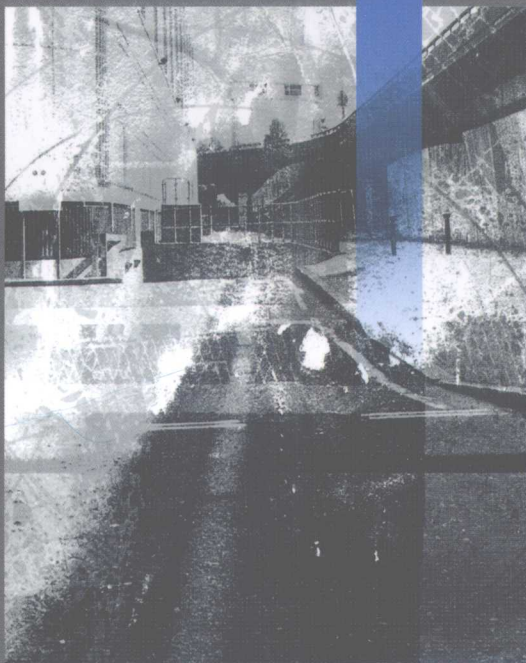


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张咏华 著

网络新闻业与 跨文化传播

WANGLUO XINWENYE YU KUAWENHUA CHUANBO

上海三联书店



张咏华 著

网络新闻业与跨文化传播

WANGLUO XINWENYE YU KUAWENHUA CHUANBO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新闻业和跨文化传播/张咏华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7

ISBN 978-7-5426-2823-7

I. 网… II. 张… III. ①因特网—应用—新闻工作—文集②文化—传播学—文集 IV. G210.7-53 G206.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3814 号

网络新闻业和跨文化传播

著 者 / 张咏华

责任编辑 / 姚望星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380 千字

印 张 / 23.5

ISBN 978-7-5426-2823-7/C·268

定价: 43.00 元

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海上传播学
文库

目 录

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 2 传播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研究:哈贝马斯协商式民主思想的学术渊源
- 17 传播基础结构、社区归属感与和谐社会构建
- 27 媒介分析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贝尼格的“控制革命”论评析
- 43 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
- 54 试论威廉斯的大众传播的文化社会学理论
- 63 一种独辟蹊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媒介系统依赖论评述
- 70 试论跨文化传播的合理化维度
- 78 现代政治文明进程中的信息公开制与知情权

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传媒业提高竞争力的策略

- 90 境外媒体进入上海的现状与挑战
- 99 迈向新闻文化集团——上海报业媒体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策略探析

网络时代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

- 114 试论信息化时代“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多种渠道
- 124 “公民新闻事业”现象及其对国际传播的潜在影响
- 143 互联网与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 154 试论国外大众文化产品在中国大陆的流行

传播科技的新发展与传媒转型

- 170 归于消失,还是再获新生?——试论传媒的发展前景兼与朱光烈先生商榷

- 178 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中国大陆的大众传播
- 205 网络挑战电视——解读国外两份最新因特网调查报告
- 212 竞争与聚合:试论电视和因特网的关系
- 221 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
- 228 电脑联网业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新老传媒业的规范管理

- 240 试论美国的传播法律和政策研究
- 247 浅谈因特网的基本特征和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
- 255 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小议
- 263 美国新自由主义和 FCC 新规定之争

政治、经济、文化视野下的网络传播

- 272 试论网络新闻媒体作为参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新兴力量
- 281 电子政府的发展:媒介化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
- 295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因特网及网站的经济模式
- 306 试论媒介文化和“赛博文化”的关系
- 313 《当今政治》为何从国际互联网上消失?

传媒内容与国际传播研究内容考察

- 318 框架建构理论透视下的英国《卫报》2005 年关于中国的报道
- 327 试论新时期党报评论对改革开放的促进作用——以《解放日报》上的社论、评论员文章为例
- 334 2006 年中外国际传播研究界的关注议题透视
- 341 试析 2005 年中国大陆的国际传播研究——以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为例

传媒实务探讨

- 352 网络时代新闻时效性在危机传播中的重要性
- 360 美国新闻传媒有关总统选举的报道失误引发的思考
- 366 新闻媒介的社会信息把关权 and 企业的“钱包”

372 后记

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视野，是指传播学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所持有的理论立场、理论取向和理论框架。理论视野不仅影响着研究者对传播现象的理解和解释，也影响着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的选取和研究结论的得出。因此，明确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对于深入理解传播现象、推动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是理论立场。理论立场是指研究者对传播现象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它影响着研究者对传播现象的理解和解释。其次，是理论取向。理论取向是指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所遵循的理论原则和方向，它影响着研究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方法的选取。最后，是理论框架。理论框架是指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理论模型和概念体系，它影响着研究结论的得出。

在传播学研究中，不同的理论视野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例如，在研究大众传播时，持自由主义理论立场的研究者可能会强调大众传播的启蒙和教化功能，而持批判理论立场的研究者则可能会强调大众传播的操控和异化功能。同样，在研究人际传播时，持功能主义理论取向的研究者可能会关注人际传播的沟通和合作功能，而持冲突理论取向的研究者则可能会关注人际传播的冲突和对抗功能。

因此，明确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不仅有助于研究者更深入地理解传播现象，也有助于研究者更科学地提出研究问题、选取研究方法和得出研究结论。同时，明确理论视野也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把握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脉络和发展方向，推动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传播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研究:哈贝马斯协商式民主思想的学术渊源

传播与民主的关系长期来构成传播学科以及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国际上许多学者先后对此进行了探讨阐述。当代西方重要思想家哈贝马斯即是其中之一。哈贝马斯以提出交往行为理论著称,他的理论将合理的交往行为视为社会合理化进程中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突出公众谈话、公众商议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性。他被国际上学术界视为协商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或者说谈话式民主(discursive democracy,又译“话语式民主”)模式(或协商式政治的交往模式,communication model of deliberative politics,哈贝马斯本人在一篇新近的论文中的用语)^①的杰出代表人物。顾名思义,在协商式民主或谈话式民主模式中,公众的对话交流,具有核心地位。作为西方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当然并非凭空构造出了他的交往理论,他的协商式民主或谈话式民主思想。哈贝马斯是高度关注自由、民主、平等的激进民主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说不仅秉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而且还折射出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杜威(John Dewey)、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等人的交往/传播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同为激进民主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杜威强调通过交往沟通活动达到社会共识的思想的影响。而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本身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欧洲一些社会理论家的影响。

当前,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空间从网下的

^① 哈贝马斯于2006年12月发表在《传播学理论》季刊(*Communication Theory*)第十六卷第四期上的论文《媒介化社会中的政治传播:民主是否仍然具有认识论维度?规范性理论对经验研究的影响》(*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Media Society: Does Democracy Still Enjoy an Epistemic Dimension? The Impact of Normative Theory on Empirical Research*)中使用了“communication model of deliberative politics”的说法。

物理空间延伸到了网上的“赛博”空间,这显然进一步凸显出传播与民主的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协商式民主/谈话式民主重视通过理性的讨论达到社会共识的思路,可以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供启示。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哈贝马斯的有关思想及其学术渊源作一探讨,以期有助于了解国际上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从中获取有关启示。

I.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协商式民主思想

哈贝马斯被誉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著述中所阐述的思想,系统恢宏博大,其研究领域横跨哲学、人文社科的多种学科,广泛涉及哲学和社会理论的许多方面,尤其是一些核心的话题,如理性、公民社会、话语伦理、民主政治、人类行为等。笔者无力也无意妄求在此小文中全面研究哈贝马斯的思想。此处拟仅就与本文论题相关的哈贝马斯有关协商式民主模式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交往行为理论中的一些观点,作一简单探讨。

哈贝马斯崇尚规范性的理论和经验式的研究分析相结合。他秉承了批判学派关注公平、公正、公众利益等的道德立场。在他的政治文明观中,信奉民主和反对强制是其基本的价值理念。他的协商式民主模式以这样的价值理念为基点,并具有强烈的理性追求和伦理道德追求。哈贝马斯在提出交往行为理论中,把交往理性当作克服现代社会弊端的良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基本概念,包括社会系统(主要有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社会系统的操控媒介,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中的)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等。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操控媒介是金钱,政治系统的操控媒介是权力。而生活世界(即人们日常生活的世界)则有自己的运作媒介——人们之间交往沟通时所使用的语言符号。^②他注意到,在现代社会(哈贝马斯笔下的现代社会,是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的现实中,出现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危机,即“系统的运作逻辑过分膨胀,金钱和权力这些系统操控媒介越来越取代沟通行为(交往行为——笔者注)而成为社会整合的力量,沟通理性(交往理性——笔者注)的活动空间缩小,人类发挥其沟通理性的能力萎缩。这样系统的控制便使人类失去了自由和尊严,人渐渐成了系统的奴隶。”^③对于如何解决这一危机,哈贝马斯给出的方案是通过发挥公共领域的推进作用,彰显交往理性。在哈贝马斯

^② 参见陈弘毅“从哈贝马斯的哲学看现代性与现代法治”,见高鸿钧、马剑银编《社会理论之法:解读与评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257页),第246页。

^③ 出处同上,第246—247页。

的社会理论中,“公共领域”的概念并不是在哈贝马斯于1982年出版《交往行为理论》、系统提出其交往行为理论时才提出的“概念”。正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所指出的,关注公共领域和实现真正的民主所需的必要条件,可说是哈贝马斯著述中的中心主题。^④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由信息和政治辩论机构论坛组成,如报刊,以及诸如议会、政治俱乐部、文学沙龙、公众集会、酒吧与咖啡馆、会议大厅之类各种政治讨论机构机制和其他公共空间,是公众理性地讨论公共事务的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的原则,涉及对于所有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的公开讨论/开放式的讨论,在这种公开讨论中话语论证/交谈论证(discursive argumentation)被用来弄清公众普遍的兴趣和公共利益,^⑤以便达成社会共识。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从西方近现代史的角度,分析了公共领域的兴起和变化。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秉承了该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从早期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形式向晚期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进行剖析之传统,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置于这种语境之下。他将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起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的西欧,它介于国家与私人领域之间,为人们提供了公开进行自由而理性地探讨其共同关注的问题和共同利益的空间。在哈贝马斯的笔下,当时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共空间——如文学沙龙、政治俱乐部、咖啡馆与酒吧、报纸、政治刊物等,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体现,有了它们,“个人和群体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塑造公共意见/舆论,在影响政治实践的同时直接表达其需要和关注。”^⑥

哈贝马斯注意到并批判了公共领域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衰落。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后期发展过程中,国家和私人企业取代了公共领域的重要职能,公共领域蜕化成了统治领域。”^⑦他描绘了“源于启蒙运动和美国、法国革命时期的自由的公共领域向当前时代传媒主导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他看来,在当代“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哈贝马斯所用的术语)社会的蜕化了的公共领域中,“舆论被政治、经济和媒介精英所管控,这些精英将舆论作为系统管理和社会控制的一个部分来管理。”^⑧也就是说,在哈贝马斯看来,在晚期

④ Douglas Kellner. *Habermas, the Public Sphere, and Democracy: A Critical Intervention*. In Lewis Edwin Hahn (ed.) *Perspectives on Habermas*. Illinois: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获自网上, URL 地址: <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kellner.html>)

⑤ 出处同注④。

⑥ 出处同注④、⑤。

⑦ 郑召利著《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兼论与马克思学说的相互关联》,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⑧ 出处同注④、⑤、⑥。

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强大的私人公司开始控制和操纵媒介和国家,私人利益渗入直接的政治职能;而政府则开始在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中扮演更加基本的角色,由此侵蚀了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差异,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差异。伴随着公共领域的衰落,公民从关于公共利益和民主参与的公共事务讨论者变成了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媒介描述和媒介话语中的政治景观的旁观者。^⑨

哈贝马斯在长期的研究生涯中通过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试图为重新振兴公共领域提供思路,这个思路就是交往理性的构建。在《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他在分析韦伯、卢卡奇等人关于合理性、行为等的观点的基础上,展开阐述了其关于行为和合理性的理论。他将行为分为目的行为、规范调节的行为、戏剧行为/拟剧化行为(dramaturgical action)和交往行为四大类,并分析了这几类行为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联。^⑩目的行为即以成功实现目的/目标为导向的行为。行为者在不同的行为可能性之间作出抉择,选用有效的手段和恰当的方式去实现某种目标。这种行为在涉及至少两个行为者相互期待对方的决定并将之列入对自己行为效果的计算的情况下,可扩张为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策略行为。“目的行为概念的前提是一个行为者与一个实际存在的事态世界之间的关系。”^⑪也就是说,目的行为与客观世界相关联。规范调节的行为涉及群体的成员,指的是群体成员遵循共同的价值规范取向的行为。其核心,在于满足一种普遍的行为期待。规范调节的行为这一概念的前提,是行为者与两个世界的关系——“即一个客观世界和一个社会世界。符合规范的行为,其出发点在于:行为者把行为语境中的实际内容与规范内容,也就是说,把条件和手段与价值区分开来。规范行为模式的前提在于:参与者对于事实或非事实可以采取一种客观化的立场,或者参与者对于正义的要求或非正义的要求采取一种符合规范的立场。”^⑫戏剧行为/拟剧化行为涉及互动参与者,“它们相互形成观众,并在各自对方面前表现自己。”^⑬这种行为的核心是在公众面前进行自我表现。戏剧行为的概念具有两个世界的前提——内心的世界/主观世界与外部的客观世界。但行为者在“将

⑨ 参见 Douglas Kellner. Habermas, the Public Sphere, and Democracy: A Critical Intervention. In Lewis Edwin Hahn (ed.) Perspectives on Habermas. Illinois: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获自网上, URL 地址: <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kellner.html>)

⑩ [德]尤根·哈贝马斯著《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中译本,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3—101 页。

⑪ 出处同注⑩,第 85 页。

⑫ 出处同注⑩、⑪,第 89 页。

⑬ 出处同注⑩、⑪、⑫,第 84 页。

自身呈现于外界公众面前时,他所真正面向的毋宁说是自己内在的主观世界”。^⑭ 交往行为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以言语行为作为中介展开的互动,体现出相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在这类行为中,行为者通过交流沟通,明确共识的语境,寻求相互理解,以期达成协调。在交往行为中,“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⑮在交往行为中,“人与世界的关系不仅像在目的行为、规范调节的行为和戏剧行为中那样,是一种直接的关系,而且至为重要的还是一种反思的关系。在这种反思关系中,行为者不再与三个世界中出现的事物发生直接的关系,而是把上述三个世界作为整个世界来理解,并依据解释、商讨的方式和原则,对事态作出相应的表达。因此,在交往行为中,行为者基于他们的生活世界,反思性地面对作为整体出现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⑯哈贝马斯认为这几类行为同世界的关联,产生了对它们各自不同的有效性要求,如以下图表所示:^⑰

社会行为类型及有效性要求

行为类型	行为者与主要关联的世界	行为的有效性要求
目的行为	行为者——客观世界	真实性
规范调节行为	行为者 社会世界 客观世界	正当性(rightness, 有的学者的相关文章/著作中用的是“正确性”一词——笔者注。)
戏剧行为	行为者 主观世界 客观世界	真诚性
交往行为	行为者 客观世界 社会世界 主观世界	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

对于同三个世界相关联、具有三大有效性要求的交往行为,哈贝马斯最为重视。他期望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和贯彻,实现一种“无暴力和统治”的社会秩序。^⑱ 对于判断理性的交往行为的标准,哈贝马

^⑭ 郑召利著《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兼论与马克思学说的相互关联》,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⑮ 出处同注⑩、⑪、⑫、⑬,第95页。

^⑯ 出处同注⑭,第73—74页。

^⑰ 出处同注⑭、⑮,第74页。

^⑱ 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一期。(获自网上,URL地址:<http://www.gongfa.com/habeimasifangtan.htm>)

斯认为这种标准在于该行为是否能满足一些程序上的先决条件。为了描述这些程序上的条件,哈贝马斯提出了“理想交谈情景”,这种情况具有一系列特征,即:讨论的机会是对所有感兴趣的主体开放的、平等的,参加者的发言在内容上不设限制;交往行为能不受权力关系所造成的扭曲;参加者持有开放的、理性的态度,愿意接受他人的比自己的意见更有理、更具说服力的观点。^① 当他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到“话语的共识会不会成为对个体的、差异的、多元化的话语的压制”时,哈贝马斯在回答中提出,根据他的“话语伦理学”,“话语的共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每一个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自觉放弃权力和暴力使用的前提下,自由、平等地参与话语的论证,并且,在此过程中,人人都必须怀着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动机和愿望。不但如此,通过话语共识建立起来的规则,还必须为所有人所遵守,每个人都必须对这种规则的实行所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在这里,话语行为的三大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② 哈贝马斯说的理性,“不是主体性的,是相互主体性的”,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主体性”的体现,“真理不是存在于孤独的个人心中,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和对话之中。”^③

II. 对哈贝马斯观点的若干批评和哈贝马斯的回应

哈贝马斯的这些思想观点在国际上学术界深有影响,但也不乏尖锐的批评。批评者们认为哈贝马斯关于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消除当今世界存在的弊病的构想具有空想性质,例如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称为“乌托邦现实主义”,福柯也将之称为“交往的乌托邦。”^④ 但哈贝马斯在对于“乌托邦”批评的回应中提出决不能把乌托邦与幻想等同起来,并坚持认为:乌托邦“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⑤ 哈贝马斯这番话可说是高度评价了

^① 陈弘毅“从哈贝马斯的哲学看现代性与现代法治”,见高鸿钧、马剑银编《社会理论之法:解读与评析》,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9—257 页),第 243—244 页。

^② 出处同注①。

^③ 出处同注①,第 245 页。

^④ 转引自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外国文学评论》2000 年第一期。(获自网上,URL 地址:<http://www.gongfa.com/habeimasifangtan.htm>)

^⑤ 出处同注②。

批判精神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又如,还有的批评者针对的是哈贝马斯对于早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描述中的理想化色彩,指出,事实上这个被他描述成理性讨论和辩论的论坛的公共领域把某些群体“排斥在外”,“参与因而是有限的。”对此类批评,哈贝马斯在其后期的著述中作出了回应。在1989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英文版时,哈贝马斯在序言中承认他所描述的,“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要素的程式化的图像”。他在后期对公共领域进行了再思考,在其1992年出版的《事实与规范之间》(*Between Facts and Norms*)中,他对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阐述,突出该领域的如下特征:“通过市民社会的社团网络而根植于生活世界”。^④在他的一篇新近发表在《传播学理论》季刊上的论文中,他再度提到了公共领域中以传媒为中介的政治交往/传播,非常审慎地探讨了这种活动服务于推进当今复杂社会中协商/商谈的合法性过程的可能性,突出强调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公共领域中以传媒为中介的政治交往/传播唯有在如下两个条件下才能推进复杂的社会中的协商/商谈的合法性过程,即:实行自律的传媒系统从社会环境中赢得独立,而且匿名的受众赋予消息灵通的精英话语/谈话和敏感反应的公民社会之间之反馈。”^⑤(此处的“精英话语/谈话”,英文中的原话为“elite discourse”,英文中的discourse有多重含义,包括“交谈,谈话”,“语篇,语段”,“论述”,但近年来有关学科中使用的较多的译法是“话语”。——笔者注)

评说哈贝马斯的思想学说并非本文的讨论范畴。对于本文的话题而言,笔者以为更为重要的是,哈贝马斯是推崇启蒙时代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理性等理念的学者,不论是他的公共领域的概念也好,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也好,都反映出他对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关注,对理性的赞扬。他把个人/私人自主权(个人追求其自己的生活),民主的公民权(亦即在政治共同体中包含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以及作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介系统运作的公共领域的独立性,视为由现代民主社会的制度设计带到一起的在三大要素。^⑥他的协商式民主模式突出强调的,是民主的过程,是通过公众意见和意志的形成程序产生合法性的过程。他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专注于推进最大限度的公众参与及对于当今社会关键问题的平等自由的讨论和争辩,并从而推动参与式民主。

^④ 出处同注⑨、⑩,第247页。

^⑤ Jürgen Haberm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Media Society: Does Democracy Still Enjoy an Epistemic Dimension? The Impact of Normative Theory on Empirical Research* (411).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16/4:411-426, 2006.

^⑥ 出处同上,第412页。

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关注核心,是理性的交往互动对于公众意见和意志的形成的作用,对于民主过程的作用。从传播研究的角度而言,哈贝马斯的有关著述,涉及传播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Ⅲ.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传播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研究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的最直接的思想渊源,自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广泛地从社会理论界前人和同辈学人理论中吸取学养的学者,其学术渊源丰富多样,其中包括大哲学家康德、笛卡儿等的哲学思想。就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协商式民主模式而言,一些西方学者如英国肯特大学的拉里·雷(Lary Ray),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马修·费斯滕斯泰恩(Matthew Festenstein)等,指出了批判理论,尤其是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同实用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通过考察哈贝马斯学说的研究主题和主要观点,不难发现,这种联系的确存在。

如前所述,哈贝马斯关注交往行为、关注谈话/话语与协商的核心,是交往行为在社会共识形成过程、在民主过程中的作用,是谈话和协商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有关思想体现了将交流/传播置于同民主政治的联系中考察的研究传统,而这一传统可说在欧美思想界由来已久。在传播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诞生之前,在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中,即已有一批欧美思想家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中突出的有著名法国社会学家、法理学家塔尔德(Gabriel de Tarde)、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等人。早在19世纪末,塔尔德即在题为《谈话》(*La Conversation*)的文章中,研究过参与式民主中国家、政府、议会、志愿团体、谈话地点、公共舆论以及社会行动等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特别强调了传媒与公众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贝马斯关于传播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的研究之学术渊源,不仅可以追溯到实用主义哲学,尤其是实用主义哲学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杜威的思想,还可追溯到更早的欧洲思想界。

从塔尔德所研究的课题来看,在这种追溯中给他一席之地显然是有根据的。塔尔德曾从若干方面,考察传媒与民主的关联。他从西方历史的角度考察了国家意识的形成,也考察了作为纯粹精神上的集体而非在特定场所集合的群体的“第二意义上的公众的形成,从中注意到报纸在社会、国家整合中的作用,注意到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对改变社会关系的特性和公众组合的条件之作用。塔尔德认为,在欧洲历史上,早期的民族国家中尚无全国化的舆论,

尚缺乏全国的“公共头脑”，而只有与地理的分散相对应的地方/局部舆论，只存在“局部的头脑”。尽管国民议会的召集使地方舆论的全国化“迈出了新的一步”，但是由于那个时代上没有报纸这一技术先进的新闻传媒，国民议会讨论的情况得不到发表，而且那个时代连邮政都不方便，报纸的缺失无法由信件来弥补，以人际传播的方式口耳相传的议会消息在传向全国的过程中发生简化或扭曲失真，真正全国化的“公共头脑”当时仍然没有产生。^⑦但是，交往工具的发展，包括邮政系统、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但最为重要的是现代印刷术的崛起，起到了“开发公共头脑的作用”。到了基于现代印刷术的现代意义上的印刷报纸的兴起阶段，印刷机“才能够使囿于一隅的东西变成国家的、欧洲的甚至是世界的东西；在此之前，地方的东西固然可能是有趣味的，却只能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而默默无闻……”^⑧塔尔德在考察“公共头脑”的全国化过程、国家意识的形成过程中还阐述了“公共头脑”层层叠压的情况，指出，在报纸出现之前，国际观点仅是偶尔出现，国际观点之下的国内观点虽然比国际关系的出现要频繁些，但也是间歇性的，全国层次之下的地方层次的观点才是几乎连续不断的。在“公共头脑”伴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兴起和印刷报纸的问世而迈向全国化的过程中，“（“公共头脑”的）“各个层次的比例在重要性和深度上都有相当大的变化”，“越是往回追溯，地方性的观点就越是占主导地位”。新闻业的工作就是要使公共头脑越来越全国化，甚至是国际化”。^⑨

塔尔德洞察到，不仅“公共头脑”的形成与现代印刷技术的兴起带来的“长距离的思想运输”紧密相联，而且群体组合方式的巨大变化、以精神上的集合的方式出现的“特殊形态的公众”的形成，也同印刷报纸的兴起紧密相联：现代印刷术的发明产生了一种迥然不同于以往建立在身体邻近的基础上的群众之公众，“这个意义上的公众从未停止增长……他们没有身体上的接触，他们的组合完全是精神关系上的组合。”在现代社会中，“当舆论潮流形成后，公众组合的条件越来越不依靠身体的邻近。目击舆论这种社会之河诞生和发展，不再依靠人们在大街或公共广场上的相会。”^⑩

塔尔德还从新闻报道和谈话之间的联系的角度，阐述新闻传播和舆论以及和民主的关系。塔尔德“认为新闻报道给每天发生在酒吧餐馆、咖啡屋、沙龙里的无数谈话提供了话题……塔尔德提出，这种意义上的谈话是一种现代

⑦ [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著[美]特里·N.克拉克编《传播与社会影响》（中译本，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⑧ 出处同上，第235页。

⑨ 出处同注⑦、⑧，第235页。

⑩ 出处同注⑦、⑧、⑨，第214页。

现象,即谈话遵循着过程公开与平等的原则,它自身正是平等的培育者。由于有了新闻报道,谈话的主题不仅全国统一,而且飞速变更”。^① 在塔尔德看来,谈话的政治功能在于“渗滤”/“过滤”(percolate)观点,即不断精炼个人的观点,使之显得更为“深思熟虑”,并在不知不觉间围绕某一特定主题形成一两个全国性的观点,而后,这种深思熟虑的观点再一次被报纸加以报道,随之成为个人行为的基准。塔尔德认为,这是现代社会中进行政治或经济选择(如选择一位政治领导人或选择一种商品)的主要途径。^② 根据塔尔德的观点,谈话/交谈“是一个经久不衰、无所不在的媒介”,而报纸“是公共书信,公共的交谈”,报纸给交谈提供话资,提供“许多新的刺激和事物,使之受到激活,并得到丰富的营养”;“如果没有人交谈,报纸就没有用武之地”。^③

尽管塔尔德这些关于传播和舆论、传播与公众、传播与民主的观点曾长期为传播学界所忽视,但是一个世纪之后,西方学者终于开始研究塔尔德的有关观点,从中总结其关于公共舆论和大众传媒的模式。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卡茨(Elihu Katz)指出,塔尔德的模式“集中于新闻报道、谈话、意见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他归纳了塔尔德的模式中,认为它“不仅将新闻报道、谈话、观点和行动系统连结起来,而且指出了‘线性序列’中的每一要素推动下一要素的方式,它还将这种关系联系起来,强调内含于新闻独立报道,某一事件以及传递舆论的反馈之中的社会控制”。^④ 可以看出,塔尔德当初已经关注到了新闻传播将公共场所的交谈讨论聚焦于一定的统一话题的作用,也关注到了在“公意”(舆论)从在大量的此类交谈讨论中会聚到最后成为个人行为基准的过程中新闻传播作为中间环节的连结作用,指出了传媒通过在聚焦公众的关注点和舆论形成中的作用,对公民政治选择——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等选择行为的影响。

不难看出,塔尔德研究的课题直接涉入传播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的范畴。哈贝马斯的研究与之具有相同的范畴。而且,我们在以下部分的讨论中将会看到,塔尔德关注的问题,也是后来美国学者杜威关注的问题。欧美学术界的相互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① 参见[美]伊莱休·卡茨《大众传播与参与式民主》,见[日]猪口孝、[英]爱德华·纽曼、[美]约翰·基恩编《变动中的民主》,(中译本,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21页。

② 出处同注①。

③ [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著[美]特里·N. 克拉克编《传播与社会影响》,(中译本),第238页。

④ 出处同注①。